

● 《人文纵览》丛书

西滢闲话



海天出版社
陈源 著
吴福辉 编

西 滢 闲 话

陈 源 著

吴福辉 编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杨仁山 朱 蓉

装帧设计:陈士修

西 澹 闲 话

陈 源著 吴福辉编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中国·深圳) (杭州浙江大学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1.6 万 印数 1—10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42-528-0/G · 108 定价: 6.90 元

“人文纵览”编辑旨趣

中国现代文艺复兴发动于“五四”前后，其后一二十年間，文艺、学术均有建树，当中情形大略为世人所知。读书界晚近推重的现代名家散文，无疑是那一时期文坛显绩之一。如今看来，此类著作不仅依然具有文学价值，且还包含生动的人文掌故和历史消息。

我们创设这套文丛，着眼于一种实际的文化氛围，旨在系统地介绍现代作家、学者撰笔的各类散文代表作品。从而通过这一侧面，检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进程中若干成就与局限。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选择书目时，并未就文化倾向求其一律。其中某些作品虽具一定地位，或未免有所偏失。所以，读书界在“拿来”的同时，亦须以审慎的眼光对待之。这是我们看待一切以往时代的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文丛所取著作，大致包括随笔、小品文、日记、书信、演讲、回忆录等多种文体形式。

前 言

吴福辉

余生也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陈西滢，多半已不可能是直接阅读《现代评论》杂志，而需经由鲁迅的文章。通过鲁迅先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里面那些犀利、漂亮的杂文，知道了他们曾经因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发生过笔战，而陈西滢站在了进步学生和鲁迅的对立面。整整一两代人对陈西滢的印象，就此种成。直到1978年我来北京不久，才第一次听说陈西滢夫妇长期从事于中英文化的友好交流，且对大陆祖国十分眷恋有情，李四光教授的归来便得到他们伉俪的襄助。这情况，在今年年初叶君健先生一篇回忆散文《陈西滢和凌叔华》中，可得到大体一致的印证。可在当时，我是深深地被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质所触动的。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1896年生，江苏无锡人。他是道地加料的英国留学生，16岁赴英，从中学读到大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1922年26岁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他是《现代评论》

周刊的创办人之一，因主持撰写该刊的“闲话”专栏文章闻名。围绕着这个杂志和稍后的《新月》月刊，陈与胡适、徐志摩等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到1934年再度赴英，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抗战胜利后为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做国民党政府外派的文化官员至1966年退休为止。然后定居伦敦，1970年客死于异国他乡。

除了在《现代评论》和《新月》时期他集中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散文，偏爱地翻译梅立克（Leonard Merrick）、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今译曼斯菲尔德）两位英国作家的作品外，陈西滢后来很少使用他的笔。教书，出国，他仿佛从写作界消失。这个少年气盛的评论家与鲁迅冲突一番之后究竟抱着何种心情甘愿隐退，应当是传记作家最感兴味的关节。总之，他在1924年到1927年间就把一生大部分文章写完，唯一的经他亲手编定的《西滢闲话》几乎便是他主要的散文创作了。

“闲话”，本源于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絮语散文体。斯梯尔和艾迪生办的报刊，取名《闲话报》（一译《闲谈者》），哈兹里特的小品集称为《席间闲谈》，很明显，这些欧美派作者连词语都是借用的。不过陈西滢与另一位专学兰姆的散文家梁遇春有点异趣，并没有操着拉扯闲散的笔调写拉扯闲散的题目，他的“闲话”大都是时评、戏评、影评、书评、作家评，切入

时弊，臧否人物，偏离了《伊利亚随笔》的正宗，更加中国化。据梁实秋回忆，《西滢闲话》当年是新月书店最畅销的书籍。

陈西滢的时评虽然较为驳杂，历史经过沉淀，面目大致显露无遗。对于所处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他并未苟且，“闲话”含有相当的批判锋芒。他讽刺京津、津浦铁路线上“镇威上将军”麾下如虎如狼的官兵“德政”（《行路难》），说民国以来的军阀开战全是抢“饭碗”，反对民众去与其他军阀演什么“反奉联合戏”（《吃饭与火并》）。他指斥政府当局腐败，关税会议在居仁堂吃一席饭，某部竟报销三万多（《捞油水》）；在外国开会委员到京前，花了五万元去洗掉前门、南池子一带“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字句（《粉饰》）。他不无夸张地宣布中国的共产制度已经实行，与苏俄不同，“是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共产》）。对于“五卅”事件，他的态度基本鲜明。做为一个受英国文化熏染极深的中国知识者，他还是迸发出对殖民主义列强的义愤。从《五卅惨案》一篇开始，他支持上海的罢工，虽不赞同盲目向英宣战，但说“可是如果英国人与我们宣战，或是逼我们到不得不作战的一步，那么我们也只好作战”，不能“只看了物质方面，把一切气节、人格、名誉都丢掉了”（《智识阶级》）。“五卅”过后不久，他看见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霞飞路的花园别墅，都为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占有，内心不禁发生“恐怖的梦

魔”：“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不久中国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外国人的中国”（《“乌龟坐电车”及其他》）。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也不比别人来得弱。

但他的讥刺民众的态度，时常引起人们的争议了。他说中国人“实在是‘程度不够’”（《智识阶级》）。他的许多讨论中国国民的文字，有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愚昧迷信、反对官僚的一面，也有一个受西方民主长期浸染而脱离中国实际，藐视群体，对芸芸众生采取绅士式立场的一面。他挖苦说中国的官绅还没有走出“中古时期”（《捏住鼻子说话》）。不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优良的人种”，指明“躺在汽车里肥头胖耳的大汉，他的聪明也许还赶不上坐在前面，手敏目捷的车夫”（《节育问题》），刻划得真入木三分。可是美国兵打了中国车夫，围观的中国路人敢怒敢言不敢动手，却招来他极度轻蔑的一声“呸”，确实太过分了（《参战》）。所以，北京女师大事件突起，他站在一旁指责学生动用群众力量“压迫”了校方，主要便是这种态度作怪。他维护章士钊、杨荫榆教育当局的言论，都有他本人的自由主义思想作基础，否则不符合当时他不断批判政府的实际情况。你看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喋血时，他挑动性地说杨德群之死是受人利用的，但至少还表示“像三月十八那样的惨杀爱国民众，只有在文化优异的中国才看得到”（《文化的交流》）。陈西滢自称尊重一切信仰，他在日本旁观选举，私心希望政府党得到一种挫折，“无产党多

占几个位置”，同情于在选举广告战中因资金不足吃亏的“无产阶级”（《日本普选》）。这是他坚持信仰自由的典型表现。但是经过许多次事件的刺激之后，他未免流露出悲哀、怨怼的情绪，在《表功》一文中感慨地说：“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权的声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在以好恶为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自然最初不容易得一般人的了解。”这是陈西滢一段颇为重要的“夫子自道”，故意用第三人称的口气，间离人我，呈现他在现实面前历次碰壁后自嘲、加上自赏、加上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绪。话说得坦白，一定意义上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陷入困境的真实缩影。

依我看，陈西滢散文里的文明批评、文艺批评、放言高论书籍、电影、戏剧、版权、展览、医疗、节育，真要比时事评论高明。中西文化关系是中国近代文化界经久不息的话题，我们讨论和实践了一个世纪，似还没有尽期。陈西滢主张全面地改造中国旧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部分。他最着力抨击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口号演变为中国精神文明从来都在别国之上的言论。他看到旧文化“同化力非常的大”，西式的医院制度移植到中华土壤就会变质，线装书读多了会染上种种陈旧思想，所以认为“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辟一片新地，最

简单的方法，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结论比鲁迅还要温和些，叫做“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再论线装书》）。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当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时候，陈西滢大不以为然。他基于上述的思想，一再说，中国这所旧房子要紧的是“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而不是清理“破烂家具”，认定胡适带头回到故纸堆去，名曰“捉妖”、“打鬼”，结局倒是掩盖了大部分国故癖们一个个“在垃圾桶里掏宝，灰土堆中搜珍奇”的事实（《整理国故与“打鬼”》）。这在“五四”退潮的背景下，是属于较为激进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观点。

一个民主性文学家的文艺观念如陈西滢在他的散文中所传诉的，也相当地具有“五四”色彩。他没有介入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与“新月”派的论争，倒是在二十年代明确反对拜金艺术，嘲弄用洋钱堆积起来的美国商业电影，赞美卓别林。他始终维护白话文的地位，听到一丝涉及“五四”文学革命这一直接成果的危言耸听，比如什么白话文体流行造成学术著述稀少等等论调，便会挺身痛加驳斥。他不懈地做白话文言优劣论的比较，说明“一样的一个意思，一样的叙述，白话可以得最多数的了解”，“白话文重自我的表现，文言文却重模仿”（《争点》），意在把白话文推行至广远，防止它在青春期受到旧势力的颠覆。他本身是一个纯

文学作家，他所说的“真正的艺术家”，“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创作的动机与态度》），很容易被看作是倨傲地鼓吹“天才论”的。如果全部纵览他的文字，他实在倡导的是一种多元的读者接受层面应有多元的文艺对应的理论。他把为多数人的民众文艺和为少数人的智识阶级文艺，分得很清。他批评搞新剧的人忘掉了“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把“纯粹的对话剧”近期内硬塞给广大的中国观众是“此巷不通”的。指出民众的戏剧应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有做，有说，有歌，有舞，有声，有色的戏剧”；而新剧属于“一种庄严的艺术的试验”，应当送到小范围的实验场地去进行，应当采用“小戏院的制度”（见《民众的戏剧》，《小戏院的试验》诸文）。基于这种文艺观，你才会对他一会儿说“文学是没有平权的”，天才作家的文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剽窃与抄袭》）；一会儿说五卅运动中“如果所有的传单都写得像《伤心歌》、《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那样的简单明了，他们那方的反响还可以大得多”（“他们那方”指市民群众，见《干着急》），不以为怪了。

说到陈西滢的“闲话”散文，一般公认它如行云流水，绵密，幽然，雍容。他对白话文章有一个很中肯的见解，是“意思不妨深些，文字不妨浅些”（《理由》），他自己的文字也正是流畅明达的一路。善于驱

遣自己的个性，不做“诤闻式”掩藏真情的文字，他总以说“心腔中的话”自许。时有讽趣，间发妙论，娴熟地运用他特有的反语、快语、警语、睿语。比如某大学当局因王尔德坐过监牢而禁排其戏，他便煞有介事地“进一个条陈”，说只允读、排莎士比亚的戏“这个端是千万开不得的，应当赶快禁止的。莎士比亚不是相传为了做贼，偷了人家的鹿，犯了案才逃到伦敦去的么”？（《“非利士第恩”》）英国一个主教说美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讲离英独立史，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他说“如果以为几个学校里的几本教科书里的几章就造成了一个革命，他的头脑也好像只配讲讲经吧”（《妙论》）。还有像这种利用中国文字特点锻成的机智语言：“中国人生的快，也死的快。在生死之间，那半生半死，不生不死的日子却过的不很快。”（《贫民与节育问题》）说得相当巧妙，直白而有深意，是他的风格。还有叙写人物，如记述孙中山先生、刘叔和、罗曼罗兰、法朗士等，也极尽其能事，惯会选择细节，夹叙夹议，保持对所敬重的人之间那种平等亲切的关系。但也有例外，便是对吴稚晖出格的推崇备至。吴稚晖在二十年代曾有一定影响，他著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上下古今谈》，在通俗地宣传“五四”新思想方面曾有贡献。他的著作气势宏大，写得俗白，跌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据沙汀、艾芜这些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回忆，是当时进步青年的恩物。吴稚晖赞成“清党”，思想趋于反动是1927年以后的

事，大体上陈西滢赞扬他还是他民主精神最为显耀的时候，但是陈把一种私淑的情感带进文章里，对吴稚晖已近乎仰视，恐怕有违其一贯的文风。

本书的编法是采用 1928 年 6 月新月书店版的《西滢闲话》和 1970 年 6 月台湾萌芽出版社版的《西滢后话》做为底本加以校勘，从中遴选出散文作品（后者做为附编）。史载 1926 年北京文坛发生过所谓闲话事件，许多文化人卷入，关于陈西滢究竟是否讲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话，传言人事后矢口否认，查无实据，变成无头案。但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陈与周作人也同样发生过争论，确是事实。《西滢闲话》当初出版，作者曾自动剪除了有关这部分的内容。据说六十年代在台湾重印该书，侨居英国的陈西滢将其中与鲁迅论争的部分删去了。为了保存文史真相，以新月书店版本作为基本依据还是适宜的。至于他对当时学生运动等社会事件所持偏见及错误认识，已为世人熟知，这部分文章未予删节，也是考虑到毋需替作者讳饰，同时相信读者自有鉴识。此外，台湾的《西滢后话》是陈西滢逝世当年稍后编就的，大约得到其夫人凌叔华的认可。它是陈西滢翻译之外仅有的第二本书。现由他的女儿陈小莹女士不远万里从英国寓所觅出，复印一份邮寄给编者，以供编选出版，我十分感谢。《后话》本应将《闲话》遗留的文字一网打尽，可能因为仓促，实际仅选了七篇散文、一篇小说，又把翻译作品混编进

去。粗粗翻检《新月》，便能见到另有多篇漏选的作品。如果将来有机会出版陈西滢的文集或散文全编，看来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趁读者诸君刚刚翻开本书，我想饶舌地最后添加几句：当作近现代文化思潮资料看，本书是有价值的，但你不要被历史人物限制住，你要超越他们；如要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散文家学英国随笔小品而形成一种特殊文体派别，你不妨记起陈西滢来，认定他是其中一员。这就够了。是为序。

1991年12月21日

于北京和平里寓所东窗下

目 录

前 言	吴福辉 1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3
民众的戏剧	8
哀 思	13
小戏院的试验	17
中国报纸的外闻	23
独身主义萧士比亚兄妹	26
开铺子主义	28
“非利士第恩”	33
清 宫	38
“观音”与国剧	40
“报娘恩”	42
“一天星斗”	43
文艺出版物	45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47
妙 论	49
洋钱与艺术	52
粉刷毛厕	60

黎明即起·····	63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65
拆了火炉搭凉篷·····	68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70
庆贺——小剧院——成功·····	75
善本展览会·····	76
五卅惨案·····	77
干着急·····	83
多数与少数·····	87
维 持·····	90
干 脆·····	91
智识阶级·····	92
行路难·····	95
象的故事·····	98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100
官气与洋气·····	104
模范县与毛厕·····	105
理 由·····	109
参 战·····	112
走马灯·····	113
争 点·····	115
利 害·····	119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121
刘叔和·····	126
南 京·····	134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136
民 气	138
捏住鼻子说话	140
共 产	142
流 会	145
粉 饰	147
文章与饭碗	148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151
版权论	155
吃饭与火并	159
捞油水	162
放 假	163
剽窃与抄袭	165
著书与教书	172
“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	176
“表功”	180
“管闲事”	184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188
再谈法郎士	196
吴稚晖先生	204
罗曼罗兰	210
线装书与白话文	217
再论线装书	223
苦力问题	229
空谷兰电影	236